

七日评中评

点评\正言

1 ■目前的城市规划中，政府把幼儿园的建设责任都推给开发商，这样一来，“入园难”说到底就是一个政府公共服务缺失的问题。在如今民办园为主体、公立园为补充的现状下，入园能不难吗？（4月20日《新京报》）——政府公共服务怎么也从娃娃开始缺失？



2 ■黑客们对攻击无辜的辩解是，为了战时少受伤，平时就应该挨点痛。假如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国家可以经常用导弹来轰炸一下民房，让大家习惯战争。同样奇怪的一个辩解是，黑客们认为他们推动了技术进步。其实，两次世界大战都极大地促进了军事技术的进步，但谁能因此就把它们说成是正义的行为呢？（4月21日《潇湘晨报》）——对黑客而言，弄清是非、不混淆黑白比炫耀技术更重要。



3 ■有学者建议，目前急需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运作，环保部门应垂直管理，应赋予环保部门强有力的执法权。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但是垂直不是万能的。（4月22日《羊城晚报》）——确实，海关垂直管理了，却仍出现了赖昌星案件。

4 与“海”有关的词汇，日益成为当下中国的流行词汇，可以预料，若干年内，“海洋学”很有可能在经济学之后，成为未来中国的又一门“显学”。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融入大海，前程无量。国人面对大海彰显责任，日益现代化的人民海军为国家的“海洋世纪”忠诚护航。（4月23日《东方早报》）——进一步海阔天空！

5 ■吉林“减副”充满“艺术性”：被免去的副秘书长都是兼职者，如吉林省发改委主任等，而作为主职的10名副秘书长依然原封不动。似乎可以说：吉林“减副”只是作秀，只有象征意义。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相比于不少地方愈演愈烈的副秘书长超编，吉林“减副”至少体现出一种权力自律意识。（4月24日《海峡都市报》）——如果如狙公般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减副”就有些耍猴的味道了。

6 ■在学术上，如何评价秦始皇，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以“玩术士”为由，呼吁中学教科书重写“焚书坑儒”，那就大可不必。历史毕竟不是一个面团，可以随意地这样那样捏弄的。（4月25日《解放日报》）——说孔老二就是孔老二，孔圣人就是孔圣人，历史被拿捏的还少吗？

7 ■强行摊派、索捐、善款征税、善款管理不严等，既是慈善的障碍和壁垒，也是慈善文化不够成熟的表现，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曲解了慈善的本意。真正健康、成熟的慈善文化，应让慈善褪去功利色彩，并通过良性的制度激励和累积，让慈善回归本意。（4月26日《广州日报》）——大爱无边，慈善无榜！

别把板子都打在五四屁股上

本刊特约撰稿\张鸣(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一个历史事件经过这么长时间，还让人惦记着，本身就说明这个事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很大。从前，对于五四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赞扬，每年5月4日，学生们都要唱歌跳舞庆祝。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五四青年节随着五一长假就给放掉了。倒是今年，五四还没到，相关的文章已经出来了。接连看了两篇，居然都是唱反调的。但无论如何，都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意见有点多元的意思了。

只是，老调子固然乏味，反调也未必唱得圆通。刚看到一篇秋风先生的文章《政治改革没必要摧毁传统文化》，颇感糊涂。文章从泰国的政治乱象和印度的大选谈起，好像意思是说印度的民主比泰国成熟一点，但不知为何却说，“从泰国政治乱象到印度民主的正常运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宪政需要传统。”而且还说，“考察这两个国家，立刻发现两者有一共通处：两国社会都相当传统，尤其是都有十分深厚的宗教传统。这一点反而成为两国建立宪政制度的优势。”难道乱象和稳象，都是优势的体现吗？正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论述印度宪政制度稳定的时候，非要提到东巴变成孟加拉，暗示这是印度宪政制度运转唯一的“中断”一样，难道在秋风先生眼里，印巴分治各自建国之后，依然算是一个国家？

当然，外国的事我不明白，可能也不好说，秋风先生无非是当个引子，重心是说，宪政需要传统，批五四反传统，罪孽深重。深重到什么程度，秋风先生的意思，新文化运动毁灭文化，似乎也连带着毁了中国的宪政，连黄苗子和冯亦代所谓的“告密”（对此事的真伪，我还存疑），也要算在五四的账上。这样重的板子，五四的屁股真有点吃不消了。

考察一个历史事件，必须回到事件发生的历史情景中去。上个世纪初从袁世凯

称帝到皖系军阀当政这段时间，中国文化的确实处于死气沉沉的局面。新教育办了多年，但是连西方的学科体系都没能建立。北大讲哲学，得从三坟五典开始讲，文学、史学、文学史彼此夹缠不清。不仅男女同校想都别想，连女生剪辫子，都会被学校开除。所谓的新学堂，除了添了些声光电的课程之外，还是经学的天下。社会上，巴金小说《家》说的大家族，也的确有可恶之处。五四前后，热情拥抱传统，提倡尊孔读经，奖励烈女殉夫的人，不是军阀就是政客，有些还是非常恶心的军阀政客，像狗肉将军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多少枪和多少姨太太，但却热衷跟末代状元诗酒唱和，在治下学校推行尊孔读经，还大印十三经。袁世凯的称帝，也许有他的不得已，但跟称帝联系在一起，毕竟是尊孔和祭天。严格来讲，传统在新文化运动没有兴起之前，已经被当政者捧杀了。这样的传统，反一反，有何不可？

就当时而言，新文化运动不仅在输入思想和学理方面，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而且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我们的学校，至少在人文方面，恐怕还还是经学的天下，哲学史讲到周公，学期就结束了，孔子还是大半个圣人，无法像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变成一个思想家供学者剖析。中国高等教育的顶峰，也恰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不仅国立和私立大学名校迭出，就是教会大学，经过五四也逐步淡化了宗教色彩，步入世俗教育的轨道。中国文化在民国时的繁荣，无论学术还是文学艺术，也是五四之后出现的，当年的学术大师和文学巨子，甚至画家、名导演和演员，无论文化态度保守还是开放，都跟五四新文化运动脱不开干系。面对这些事实，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毁灭文化，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如果单从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主义流向就否定五四，其实也没道理。很简单，

“吃五四饭的”（蔡元培语）不仅有激进的左翼，还有激进的右翼，比如国家主义者，他们对传统往往情有独钟，还有自由主义的右翼，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人，好像对中国后来的激进不该负责的，而他们的学术研究，也走向了整理国故，即使反传统，也反得不彻底。而且，五四还有更多走中间道路的人，大批走教育和实业救国道路的人，看看他们的回忆，好像血管里也流淌着五四的血。

至于把所谓的告密账也算在五四头上，实在太冤。就算黄苗子和冯亦代两位老先生都告过密，但是两位不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他们在旧中国也生活过很长一段，他们老师就更是如此。如果说反了传统就会告密，为什么他们在1949年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更何况，我们民族的传统中，也有法家的一份，那一份里，其实就有告密这东西，反传统，如果反了到传统的酷吏风范头上，其实反而不会告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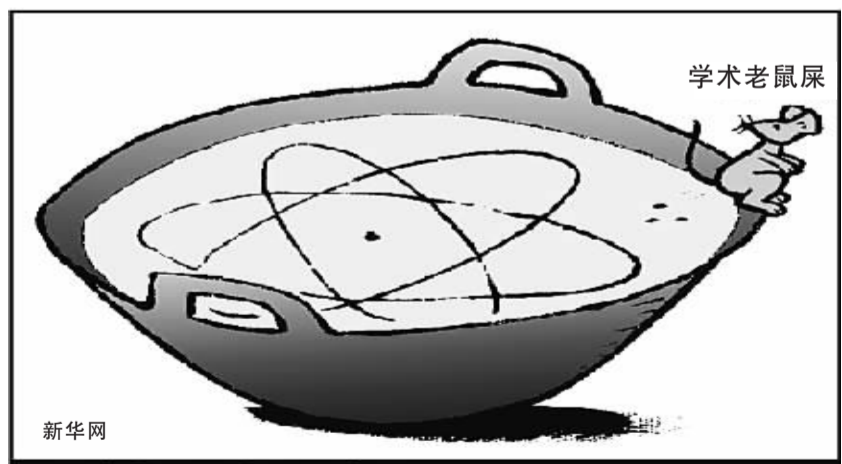
其实，传统就单算了儒家一份。那么，五四反过之后，其实传统并没有被反掉，上层社会，有蒋介石支持的新保守主义的复兴，底层社会，则大体诗礼依旧，人们婚丧嫁娶，宗族祭祀，还是老一套。这一套真正被摧毁，是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超大规模的扫荡，乡村精英连同文化精英一并被毁灭，改造之后的事。这种革命的结果，怎么可能都算在五四的账上？不能说革命领袖中有几个五四青年，就说革命就是五四延续，别忘了，还有好多五四青年，是自由主义者呢。

正像印度的传统，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一样，中国的传统，也是一言难尽。反传统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些文化人的作为，其实无论怎样反，都反不掉，导致文化和传统被摧毁的，并不是五四。

先锋杂文

呼唤大学里的“赵子龙”

本刊特约撰稿\周英杰(烟台 资深媒体人)



“校长”，更多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官员而已。

记得胡适先生生前曾经说过“长坂坡里没有了赵子龙”之类的话。说一个缺少了英雄赵子龙的“长坂坡”，事实上已经不再是原先的那个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的“长坂坡”了，而是一个平庸无意义的“长坂坡”。胡先生此语生动地道出了一个特殊人物所具备的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

如果我们把胡适的这句话用于中国眼下的大学教育问题上，是不是同样也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大学之所以被人广为诟病，一个主要的软肋就在于：我们虽然仍有清华大学，但却没有了梅贻琦；虽然仍有北京大学，但却没有了蔡元培和胡适；虽然仍有浙江大学，但却没有了竺可桢；虽然仍有南开大学，但却没有了张伯苓。好不容易在1980年代出了个“不愿做武汉市市长、只愿做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但其后来的结局从世俗的意义上说，似乎也实在难说功

德圆满。

正像没有了赵子龙的“长坂坡”注定是一处平庸的“长坂坡”一样，没有了梅贻琦、蔡元培这样的校长的中国当代大学，也就只能办成类似于高级“职业培训所”的机构，成为“只认识权和钱，骨子里并不崇尚知识和学问”的准名利场，成为批量制造“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乃至像某大学教授孙东东那样的势利小人的大染缸。

因此，要使中国的大学真正回归到“象牙塔”，回归到大学精神的本位，除了要彻底改革当前中国大学的运作体制之外，我以为最为关键的一点也许是要期待出现一批像竺可桢、张伯苓乃至刘道玉这样的大学校长。非如此，则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要想跃上世界上最先进的行列，那实在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天下思想